

俯身弯腰抱父亲

栗旭晨

我常常想起父亲，想起父亲临终前佝偻的身体、消瘦的脸庞、尴尬的笑容和他无力的叹息。音容宛在，犹如昨天，我下意识地张开双臂，想给父亲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，却扑了个空，梦中热切的希望化作一缕飘逝的烟云，渐行渐远。

2019年春天，92岁高龄的父亲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，面容清瘦，步履维艰，不得已拄上了拐杖。俗话说“男怕穿靴，女怕戴帽”，到了5月，父亲的小腿和脚面开始肿痛，连走出家门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我向单位请了假，回到村里照顾父亲，以减轻母亲的压力。父亲每天躺在炕上，像孩子似的任我给他洗脸、刮胡子、喂饭、擦洗身子，偶尔看看电视，听我读报讲故事，也听母亲唠叨。有时候碗里的饭盛得多了，父亲吃不完，我便接过来“打扫战场”。

正逢7月，暑热难耐。一天上午，从城里来了一批客人造访，有市住建局局长、园林处处长和电视台台长，他们面露难色地说，忻州市正在创建国家园林城市，亟须赶制一部电视汇报片，想请我撰稿。一边是躺在炕上不能自理的老父亲，一边是领导们期望的目光，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操守驱使我答应了。

从第二天开始，我把父亲从炕上抱到单人沙发上，为防摔倒，用腰带系在父亲腰间，与沙发扶手绑定。这是我第一次抱起父亲，父亲腼腆地笑笑，显得有点难为情，我心头一热，有泪盈眶。我把十几份文字材料放炕边一字摆开，在手机上开始了写作。3天后，三千多字的《东风吹来满园春》的电视汇报片脚本写就。此后不久，忻州市创建园林城市一举成功。那3天里，父亲一直坐在我身边，默默地看着我，陪伴着我，成为我创作时最大的动力。

此后，只要天气晴朗，我就把父亲抱到院中的枣树下通风透气晒太阳。每次抱起父亲，就像抱着一件珍藏多年的宝贝，生怕磕着碰着。父亲伏在我怀中，可以清晰地听到他的呼吸声，温热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父亲身后是6间瓦房，面前坐在小马扎上的是他养大的儿子，瓦房和儿子都是他打下的江山。坐久了，起风了，我附在父亲耳边说回家吧，父亲固执地摇摇头说，不急，再坐坐！像极了小时候，父亲领着我去看戏，父亲一直抱着我，抱久了，便把我举过头顶，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，这样可以看得更清楚。我不懂得怜惜父亲的劳累，赖在脖子上不下来：不嘛，再坐坐！后来，父亲托举着我，把我送出了乡村，送到了外面更大更美的世界。

农历六月二十九，是父亲的生日，我们商定在家里为父亲过生日。家人在屋檐下摆了两块木板当餐桌，做了凉菜炒菜，包了饺子，买了油糕。我把父亲抱出来，依旧坐在沙发上，父亲像得胜班师的将军，注目检阅着他的子孙们。

8月15日下午，由于单位有事，我要返城上班了。我蹲在父亲面前道别，父亲怔怔地盯着我，问我上哪儿去呀。我说，回去上班呀，过几天再回来侍候您。父亲点点头。想不到，“上哪儿去呀”竟成了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。7天后，上午10点，我再次回到家中时，父亲已经气若游丝，听不到我撕心裂肺的呼唤。我轻轻地抱父亲抱在怀里，父亲无力地靠在我的肩膀上，溘然长逝。

“三七”过后，我要回城上班了，我把父亲的遗像揣在怀里，放在离心脏最近的地方。我知道，心脏是生命的源泉，它的跳动是最有活力的旋律。我的怀抱里很轻，也很沉重，这是父亲最后一次躺过的怀抱。

家门口的身影

周元斌

车拐过路口，一回头，发现母亲还站在家门口朝我离开的方向张望。

元旦时，我回了一趟老家。正午时分，母亲在厨房给我做饭，我帮她烧火，顺带聊些家里和学校的事。灶台间笑语欢畅，母亲的眉头是舒展的。

吃饭时，我说下午就走，母亲怔住了，筷子停在半空，缓缓说道：“不再多住一个晚上？”

“学校还有事要忙。等过年再回家好好陪您！”

“知道你忙，可再忙也要好好休息！”显然，母亲心里有些落寞。

吃完午饭，姐姐开车送我去高铁站。我背起包，提着母亲给我准备的一大袋蔬菜，坐上车。这些菜，都是母亲一捧土一滴汗种出来的，再经过严霜的冷冻，格外脆甜。母亲送出门外，看着我，似乎欲言又止。

我挥挥手说：“妈，外面冷，您回去吧！”可车子拐弯时，母亲还在门口张望。我知道，我匆匆回归又匆匆离开，让她感到凄清与孤单。我回头望着，与母亲的身影渐行渐远。

这几年，母亲经历了太多的悲伤。生

活在农村的她，身边的同辈相继离世，她的世界在静静坍塌。

到外地工作后，我只有逢年过节和放寒暑假时才能陪伴她。其余的日子，都是她寂寞地守在乡下。尽管姐姐们经常回家看望她，尽管时常有一两位婶婶和邻家奶奶来家里串门，可也是坐一坐后就各自回家了。年迈的母亲，只能去菜园和地头通过劳动来消遣白天的时光。她用劳作填满日子，用沉默消化离别，用一遍遍的叮嘱编织着与远方子女的情感纽带。而我身为子女，所能做的，只是在不断的告别中，叮嘱她走路小心、天冷加衣、按时吃饭而已。

这些年来，像我的家乡一样，许多年轻人头也不回地游向城市，留守农村的老人，他们的孤独是双重的——既要承受生命一点点地消逝，又要面对整个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。

列车飞驰，故乡渐渐远去。我握了握手中装满蔬菜的布包，那新鲜的蔬菜叶脉上还留着故乡的白霜。母亲在电话里从不言孤独，她只说：“菜要吃新鲜。”可那些沉默的蔬菜，那些欲言又止的送别，那些深夜亮着的灯，都在替她说出另一种语言。

乡关何处

张浩然

窗子外头，是这座北方城市岁末的天，灰蒙蒙的云低低地压着，沉甸甸地悬在鳞次栉比的楼顶。风贴着楼壁的缝隙挤过来，发出呜呜的低鸣，是钝刀子，一下一下，刮着人的骨头。

又是一年了。每年年底，仿佛有一道无形的、冷硬的闸，横在日子的当口。这光景，这无端端的、黏稠的烦闷，大约便是所谓年底的情绪了罢。它像这弥天的湿冷，慢慢地沁入，最后，便全聚拢到心口一个空落落的地方，化开了，成了温温的、却又无可奈何的一汪乡愁。

我的乡愁，始于16岁那年的一个清早。北方的冬晨，空气冷冽得发甜，厚厚的一层白霜，覆在田埂的枯草上，亮晶晶的。一只粗帆布的行李袋，母亲连夜拾掇的，鼓囊囊地立在堂屋的门槛边，像一颗沉默而巨大的泪。父亲不说话，只一口接一口地抽着呛人的纸烟，烟雾笼着他沟壑纵横的脸。母亲只反复叮嘱：“到了就写信，莫叫人惦记。”我点头，喉咙里像堵着东西，半个字也吐不出。村口的老槐树下，长途汽车卷起一蓬黄尘，我回身望去，家的影子，父母兄弟的影子，便在那一团迷蒙里，越来越淡，终于小成一个墨点。

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离别。像钝刀子割肉，起初是不觉得疼的，只觉得空；等到车越开越远，那空才一丝丝地渗出凉意来，慢慢地，才觉出那绵长而真切的痛来。

后来，便是数不尽的车站与月台了。求学的绿皮火车，咣当咣当地，将我载向更远的北方。再后来，工作，奔波，生活的担子一

年重似一年。城市是慷慨的，它给你霓虹，给你高楼，给你看似无限的可能；可它也是吝啬的，吝啬到不肯给你一方能安稳做梦的屋顶。多少回，在租住的小屋里，被凌晨的汽车喇叭声惊醒，恍惚间不知身在何处。

父母亲的来信，渐渐由纸笺变成了电话里迟缓而谨慎的问候，兄弟们也各自成了家，散落在不同的城市，年节的相聚，成了日历上一个一个需要奋力勾画才能勉强凑齐的圆圈。

后来，父母相继离世。我锁上老家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，将钥匙塞进贴着心口的口袋。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，斜斜地映在村道上。我知道，这一去，我便真的成了一个故乡的客了。那锁，锁住的不再是一间屋，而是我整个莽撞而匆促的少年时代。

窗外的风声更紧了，呜呜地，像旷野里迷路孩子的呜咽。桌上的茶水早已凉透，结了一层暗色的膜。我站起身，走到窗前，玻璃上蒙着一层雾气，我用手指在上面无意识地划着。划着划着，竟现出两个歪斜的字来——“回家”。

可是，家在哪里呢？

乡关何处？古人问得苍凉，而我连那份苍凉的底气也无。我的乡关，不在某一处具体的地图坐标上，它消散在16岁离家的晨雾里，碎裂在无数次告别的月台上，最终，凝结成胸口这枚冰凉而沉默的钥匙，和心底这一滩，一到年底，便漫漶开来的、无声的、温吞的惆怅。

风雪愈急了，密密地扑打着窗玻璃，像是要叩问什么。



本版图片来源于网络